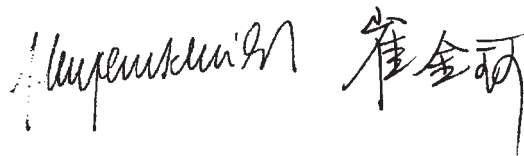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戰場

——共識與和解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周年和結束四十周年。雖然在中國公開討論這場半個世紀之前的政治運動還受到很多限制，但今年文革討論還是表現得特別活躍。親歷者、研究者和一部分年輕人從不同角度嘗試回憶、理解、構建當時的場景和文革的歷史意義，引發了出人意料的新的社會反響。一直對這一歷史事件保持沉默的官方媒體在2016年5月17日凌晨終於發表了兩篇關於文革的評論文章。其中《環球時報》的文章指出，中國社會在文革的認識上不但沒有「撕裂」，而且具有「相當穩定的共識」，那就是1981年中國共產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提出的「徹底否定『文革』」^①。這一論調與我們在現實中的觀察並不相同——關於文革的回憶和評價已經嬗變為不同群體、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社會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戰場。中國社會對這一五十年前的重大歷史事件還遠沒形成共識，更談不上達成和解。

本文通過圍繞2016年「五二」紅歌會事件和2014年宋彬彬道歉事件的討論，分析文革記憶如何成為黨內和社會上不同人士之間相互競爭的戰場：有人期望對文革作徹底反思，並導向可能的和解；但也有人希望能夠繼續文革後還沒結束的鬥爭。作為與上一個文革紀念年份2006年的關於文革討論的對比，2016年的「毛派」（其中有很多人是經歷了文革的造反派）表現得非常活躍，他們嘗試構建一種對於1981年〈歷史決議〉的反論述。在他們的評論中指責了老紅衛兵（以「紅二代」為主）和他們的父母要為文革初期嚴重的暴力事件負責，讚揚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偉大戰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努力並沒有被當今的官方全面否定。本文認為，2013年習近平提出的對於1949年後歷史的新理解，即「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觀點^②，以及官方媒體提出的對於文革時代新的分割論，對〈歷史決議〉中「全面否定文革」的結論提出了挑戰。

一 記憶戰場：以「五二」紅歌會事件為例

2016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萬人禮堂上演了一場名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交響演唱會」。在新華網對於這場演出的報導中，演出的主辦方包括了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辦公室、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團中央中華未來之星全國組委會和中國歌劇舞劇院這樣的官方單位，負責報導的則包括了人民網、新華網、中央電視台等官方新聞機構。在這場被認為具有官方背景的演出中，演出曲目裏充滿了文革的歷史印迹和個人崇拜的色彩。演出中出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紅色歌曲、文革時期「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政治口號，以及《不知該怎麼稱呼你》這首被認為導向新的個人崇拜的歌曲^③。

在文革爆發五十周年的紀念日（2016年5月16日）即將到來的敏感時刻，在有關部門不斷收緊對文革討論的政策背景下，這樣一場演出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一部分人指責官方不僅沒有堅持1981年〈歷史決議〉中「全面否定文革」的結論，而且明目張膽地宣傳文革的歷史遺產，是開歷史倒車的行為。黨的高級幹部後代馬曉力^④發表了一封致中央辦公廳的公開舉報信，認為該演出是「文革文化再現」，完全違背〈歷史決議〉的精神，目的在於「為最高領導人挖坑」^⑤。在受到了社會輿論大量的指責之後，5月6日，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委員會、中國歌劇舞劇院分別在其官網發表聲明，認為受到了欺騙。他們指出，名為「五十六朵花」的少女合唱團需要為此負責，因為她們虛構了「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辦公室」這個機構來騙取信任。「五十六朵花」團長否認了對她們演唱文革歌曲和個人崇拜的指責，但是迴避了對於虛構中宣部下屬機構的質疑^⑥。這個戲劇性的轉折讓整個事件充滿了陰謀論的色彩。其後官方對馬曉力公開信的態度成為現在對於文革討論的政策的一個典型縮影。

在最初關於演唱會的官方宣傳稿中，並沒有將紅歌會同文革聯繫起來，更沒有同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聯繫起來。新華網的報導文章指出，該演唱會「縱情歌唱着共產黨」，「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是一次主旋律藝術推陳出新的成功嘗試和檢閱」^⑦。從歌曲到宣傳，這次演出並沒有任何不符合黨的意識形態政策的地方。即使是這樣，面對兩個官方機構表示自己受騙的聲明，官方只是發出了《環球時報》的一篇評論為自己辯護。這篇文章承認該演唱會的某些歌曲和口號「容易喚起特殊政治記憶」，但否認這次演唱會有任何「官方背景」；關於該演唱會的所有事實不過是「某個民間群體租用了人民大會堂的場地」；「官方如果搞活動，首先會把握政治上的正確和嚴謹，不太可能讓這麼容易造成『文革聯想』的歌曲和口號出現」^⑧。這個事件明顯為不少人造成了不便，因此包括《環球時報》的這篇評論在內，新華網等媒體上所有關於該演唱會的報導都很快被刪除。這樣的姿態引發了對官方態度的廣泛批評。反對文革的人批評官方在評價文革問題上態度曖昧甚至倒退，支持文革的毛派則認為「共產黨人不唱紅歌唱甚麼？」他們認為官方急於撇清跟該演唱會關係的做法，「實在是沒有多少出息」，是缺乏「理論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表現，並認為「把唱紅歌同文革聯繫起來，是否定中共全部歷史的毒計」^⑨。

在批評者的論戰文章中，還對舉報者馬曉力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這種批判首先集中於馬作為「紅二代」的身份。一篇毛派的論戰文章指出，馬曾經擔任過某「紅歌」演唱團團長的經歷^⑩，認為她的舉報行為是「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⑪的表現^⑫：

當他們需要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和影響時，他們就把自己裝扮成毛主席的「好學生」，打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唱起了紅歌，籍〔藉〕此欺蒙群眾，乘機攫取權力。當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妨礙了他們向官僚資產階級蛻變，並成為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可逾越的障礙時，他們立即撕下「紅色」的面具，露出了新生資產階級份子的猙獰面目，徹底墮落成爲人民的公敵！

馬曉力認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號影響了中國的外交關係。根據毛派的判斷，這只能說明這個所謂「紅二代」已經被金錢和資本腐蝕，思想和靈魂已經變質，充當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⑬。

對「紅二代」在文革中的表現，毛派的觀點則更加直接：正是他們在文革中違反毛澤東「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需要對文革中的「打砸搶」以及「打死人」等暴力行為負責^⑭。而他們正是毛發動文革所要打擊的對象：「在文化革命時期，他們是打砸搶集團，在先富時期，他們是『官倒』集團，在顛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時期，他們是掠奪集團，在與國際接鬼〔軌〕時期，他們是漢奸集團，在瓜分中國資源以後，他們是移民集團……」^⑮

從毛派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們利用討論「五二」紅歌會事件的機會，來宣傳他們對文革以及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評價。他們全面否定的不是文革，而是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政策。從常識出發，人們很難相信這樣一場在人民大會堂出現的規模宏大的演出是一次欺騙性的活動，這一點也得到了「五十六朵花」團長的證實：「一個民營團體是沒辦法申請到人民大會堂演出的，只能找有『資質』的單位去申請才能實現……」^⑯

這一次演出給人們發出了這樣的信號，提醒大家「翻案風」又颳起來了，只是跟上一次的方向是相反的。毛派認為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激烈到只能通過一次新的群眾運動來解決，這對很多文革受難者和「紅二代」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唯一讓他們感到安慰的現象就是，馬曉力反對文革、支持1981年的〈歷史決議〉的行為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把這個現象同幾年前的文革討論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現在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14年1月，宋任窮之女、老紅衛兵宋彬彬為她在文革中的行為道歉的時候，似乎支持她的人比批評她的人要少。她和其他一些「紅二代」的代表提出反思文革的要求時，基本上都遭遇了從「左」到「右」的一系列批評，得到了與原初目的截然相反的結果。

二 記憶戰場：以宋彬彬的道歉事件為例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中被打死^①。她是在文革初期所謂「紅八月」的暴力事件中第一個被自己的學生打死的校領導。1966年6月底，工作組開始發動學生批判卞校長和學校其他的主要領導。在批判大會上，卞校長開始遭到學生毆打。在工作組撤離學校之後的8月5日，卞校長和其他的校領導在校園中經歷了長時間折磨、強迫勞動和毆打，最終卞校長不幸身亡，稱為「八五事件」。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該校學生宋彬彬在城樓上為毛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成為當時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時刻。因為宋當時被認為是紅衛兵的代表人物，從此之後，很多人認為她能夠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原因是她積極地參與了毆打卞校長，並且毛對紅衛兵這樣的暴力行為是贊成的。

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回憶和爭論之後，這一事件也逐漸發展成評價1966年老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事件。2014年1月，宋彬彬和她當年的同學為她們在該事件中的參與公開道歉，從而引發了文革參與者之間的一場出人意料的爭論。許多人並沒有讚賞宋面對自己過去的勇氣，而是從各個角度對她的道歉進行了批判。積極推動宋彬彬公開道歉的吳迪遺憾地表示，本來希望能夠推動更多人來關注文革，結果事情的發展卻阻礙了對文革的反思^②。

宋彬彬和她的戰友的記憶論述中最飽受爭議的內容在於，她本人以及跟她一起研究所謂「八五事件」的同學都不願意自稱為「加害者」，而是自稱為「有責任的事件涉及者」，具體的責任在於「沒能保護好校領導」^③。同時，她們也沒有說出在當時來自中國精英階層的學生中，誰積極參與了對老師的毆打和迫害，即使這樣做會讓她們無法洗脫參與虐殺的嫌疑^④。此外，雖然宋彬彬等人在2014年的公開道歉中有承擔部分責任的意涵，但是她們認為自己不需要對卞仲耘之死擔負起全部責任。同時，宋彬彬特別強調自己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不幸遭遇。她們不認為自己是加害者，原因在於她們認為自己屬於文革中的受害者群體。這樣的分析很可能是符合史實的，但在現有的條件下，因為她們沒有說出被認為需要對「八五事件」負全部責任的人的名字，其解釋顯得缺乏說服力。因此，有人指責她們沒有說出真相，道歉看起來更像是自我辯解；所謂「沒能保護好校領導」，只是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紅色優越感^⑤。

毛派對宋彬彬道歉事件的反應特別強烈。他們認為，〈歷史決議〉所代表的「全面否定文革」的結論，目的在於永遠剝奪群眾監督政府的權利^⑥；老紅衛兵就是受他們父母（「官僚走資派」）指使有意破壞文革的發動。這些人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希望通過打砸搶爆發混亂，從而避免針對官僚走資派的文革在全國展開^⑦。即便卞仲耘確是無端被害，也不應該由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負責，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毛本來的想法，而正是毛意圖打擊的敵人發明出來用以反對文革的陰謀：「因為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鏟除貪官污吏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⑧

截然相反的對抗論述和記憶在現實中確實存在，它們持續地傳遞着對〈歷史決議〉中的權威論述的挑戰意識。

三 「記憶團體」的分散性和對抗性

從2016年的「五二」紅歌會事件以及2014年宋彬彬道歉事件中，可以看到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的形成。今天的中國社會並沒有形成有關文革的共識，文革中存在的各種活動團體在回憶文革的過程中發展成為不同的「記憶團體」(Carrier Groups)。「記憶團體」是一個記憶學的概念，指的是以相同的歷史經驗為基礎組成的、曾經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時間經歷過同一歷史事件的「內部人」團體²⁵。例如，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組成不同的記憶團體來分享他們對於戰爭的記憶，文革的參與者則通過與當時的朋友交流來保存他們各自的記憶。其中，文革時期在同一地點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這種記憶可能是一種受害者的創傷記憶，也可能是加害者為了保護自己、掩蓋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自我英雄化的記憶。在一個團體內部，成員之間可以積極地交換彼此的回憶；但在一般情況之下，他們會與「外部人」保持距離來構建他們自己的歷史敘述。記憶團體的參與者一般認為，只有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才有資格參加討論。因為這種回憶的形式不是公開的，所以「外部人」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文革似乎已經被遺忘了，但實際上對文革的記憶隱藏在記憶團體的集體記憶中，保存於由不同的記憶團體構建出的各自不同的回憶和論述中。

現在看來，記憶團體對於文革的許多理解依然建基於文革時代的語境。因為1981年的〈歷史決議〉對很多涉及到當時參與者的問題沒有提供正面的回答，所以不同的記憶團體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回答，而他們有關文革的敘述往往與〈歷史決議〉中的官方給定版本有巨大的差別²⁶。黨的有關文革的敘述，無法完全控制人們對文革的記憶，但社會上也無法產生共識。這樣造成的一個現象就是，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是極端分散的。從上述兩個案例中可以發現，一個記憶團體內部可以形成共識；然而一旦它把這個共識公開化，就會碰到記憶的分散性問題，很多其他記憶者會根據各自內部產生的敘述提出對抗性意見。

在近年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改革開放政策的開啟者正在為有可能失掉他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積累的社會、經濟、文化資本(即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而憂慮。他們很敏感地發現針對改革開放政策本身以及當時的改革者在1966年下半年所扮演的角色的批判正在構建。而改革者的後代(如宋彬彬)正在前瞻性地保衛她們關於文革初期論述的正確性，從而擴大她們在文革記憶中的影響。這些都加劇了記憶戰場上的分散性和爭奪記憶話語權的努力。在這裏，記憶團體不僅僅是文革時代的朋友一起回憶文革經歷的一個團體，它同時起到了保護其內部參與者、為參與者爭取承認和支持的作用。

高默波和楊國斌曾經指出，在2005至2006年輿論已經開始利用討論文革的機會來批評改革開放政策，批評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和貧富差距的拉大²⁷。而在2016年，

毛派不僅僅利用文革來攻擊鄧小平和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還把文革視為今天中國社會存在的所有問題的反面：工人和農民可以「當家作主」，而不是被下崗和失地所威脅；國家更加獨立自主和強大，而不是被帝國主義強加的政治經濟秩序所壓迫。在他們的言論中，文革成為一個對現實的所有不滿情緒的對立面，通過讚揚文革從而批評當下的不公平，通過回憶文革從而鼓動完全被去政治化的民眾起來反抗。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都把自己視為文革的受害者，這也與2006年的情況不同。「受害者」以前指的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他們在社會上從來沒有佔有優勢，「受害者」中的很多人被平反、恢復名譽之後，這個標籤顯得並不那麼受歡迎²⁸。2006年的文革討論中並沒有強調受害者在文革回憶中的重要性，但在2016年，老紅衛兵和毛派都把「受害者」的標籤當作社會資本，用以爭取道德高地、影響力和話語權。老紅衛兵把自己當作文革受害者，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以及家屬被劃分為「革命的對象」而曾經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另一方面，毛派則認為雖然他們一直站在正確的、支持毛澤東的立場上，但是功績卻從來沒有得到承認，因此，他們也把自己當作文革的受害者，但又認為自己是改革開放的受害者。根據毛派的論述，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們作為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毛的積極支持者，卻從來得不到像「紅二代」那樣的經濟、社會地位。因而，對受害者的身份的爭奪就成為各個記憶團體之間鬥爭的焦點。從這個角度出發，文革的派性對立到現在為止還遠沒有消失，文革的鬥爭在不同記憶團體的討論中還在繼續。

四 〈歷史決議〉問題

長時間以來，官方對待文革的立場是以1981年的〈歷史決議〉為基礎的。但是，〈歷史決議〉並沒有成為關於文革的主導敘事。社會上關於文革的記憶高度分散化，派性並未消除，而且各個角度的反敘事都在不斷構建的過程中。這當然與現實政治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但這一切變化都離不開〈歷史決議〉存在的內在問題。中共在1981年通過〈歷史決議〉，目的在於形成黨內和社會上有關1949年以來、特別是有關大躍進和文革歷史的共識。但〈歷史決議〉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原因在於它本身所包含的論述缺位、模糊和矛盾。文革結束之後的「清理三種人」運動和禁止文革討論的意識形態政策擴大了這一問題的後果。

首先，〈歷史決議〉中的論述缺位存在於對事實、評價和責任認定等多個層面。例如，對於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歷史決議〉這樣評價：「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²⁹現有的資料和口述研究都證實，正是軍隊控制局勢的階段出現了文革中最嚴重的暴力鎮壓行為（所謂「綠色恐怖」時期），其造成的嚴重後果遠超造反派派性武鬥所造成的後果³⁰。因而，所謂「一些消極的後果」的論述顯然遠遠不夠。

另外，〈歷史決議〉沒有給出對文革初期的暴力行為的評價。它在評價這一時期的時候完全退縮了，並沒有譴責紅衛兵運動^⑳。儘管事實已經非常清楚，老紅衛兵深深地捲入了文革初期的暴力事件，但是並沒有人因此公開承擔罪責。許多老紅衛兵來自黨的最高級別幹部家庭，他們對文革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會特別複雜；但更複雜的問題是，〈歷史決議〉為甚麼沒有提及黨的高級幹部子女在1966年夏天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與他們父母的關係？

〈歷史決議〉對老紅衛兵沒提出批評並不是偶然的。作為中共精英階層的後代，根據中國的傳統，這些年輕人必須「接過父母的班」從而保持他們的家族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在2016年的文革討論中，矛頭直指老紅衛兵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歷史決議〉承認了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暴力事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那麼選拔他們接班就會失去合理性；而如果他們接不了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精英體系就可能面臨滅亡的危險。

其次，與論述缺位相對應的，還有論述模糊的問題。〈歷史決議〉不僅迴避對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行為作出評價，而且對造反派也沒有給出直接的結論。〈歷史決議〉中既沒有出現「紅衛兵」一詞，也沒有出現「造反派」一詞，它只是模糊地提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以及「極少數極端份子」、「投機份子、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後者的主要錯誤在於「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㉑。然而，這種描述並不特別指涉造反派，因為老紅衛兵也做過同樣的事情^㉒。這種模糊的處理手法為記憶戰場中派性對立的延續留下了可能性。

再者，〈歷史決議〉還存在內在的敘述矛盾。文革結束之後毛澤東的對立一方掌權，他們也利用批評文革來批評毛，從而為改革開放政策爭取支持。但同時他們也不敢像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樣去全面否定毛澤東。一方面，改革開放政策是對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之否定；但另一方面，提倡、落實這項政策的人，都是毛培養出來的人，他們在黨內的地位無法擺脫毛的歷史遺產。這是〈歷史決議〉所面臨的一個沒法解決的問題，而它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全面否定文革」。造成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於，〈歷史決議〉試圖避免因為對文革和毛的評價而危及中共的執政合法性^㉓。到2006年為止，有關〈歷史決議〉的討論都集中在要不要進一步全面否定文革；而到了2016年，我們發現甚至〈歷史決議〉對文革全面否定的評價，都有人因為覺得過份而不能接受。

與〈歷史決議〉的論述缺位、模糊和矛盾相反的，是文革後為老紅衛兵和「三種人」^㉔之間劃上了清晰界限的各種政治措施。〈歷史決議〉被通過之後，老紅衛兵只是被認為在文革初期犯了可以原諒的錯誤。他們並不應該被譴責，而是應該被教育從而改正錯誤^㉕；他們不但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㉖。與此相反的是，那些被認為屬於「三種人」的，在文革中和文革結束後從各個政府崗位上被清除出去，很難有機會再回來。對於文革中所有的暴力破壞行為，官方似乎認為都應該由「三種人」來承擔責任。顯然，這並不是事實。這就是為甚麼現在所有的文革論述中，毛派都在努力推翻〈歷史決議〉中對於文革的評價，從而洗刷被「污名化」的文革和造反派運動。

〈歷史決議〉中存在的問題也與制訂決議時的歷史環境有關。文革結束之時，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還存在着緊張的派性對立關係。〈歷史決議〉構建了「普遍共犯結構」(universal complicity)來試圖平復這種緊張的派性對立關係³⁸。這就是說，〈歷史決議〉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在於，通過讓所有人對文革的「錯誤」負有責任從而克服文革遺留的派性問題。但是這種努力並沒有得到文革親歷者的廣泛接受和支持，而且從一開始就飽受爭議。而事情的發展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現在，爭論者發現需要通過議論文革來保護、改善甚至改變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他們寧願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也不願意接受加害者的身份。這讓達成派性的和解變得更加困難。同時，改革開放政策的尷尬之處在於，它跟毛澤東所反對的「資本主義復辟」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不許談論文革或許是最實用的解決辦法。中共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以「宜粗不宜細」為口號，努力避免對文革作公開討論，這當然並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

五 官方歷史編纂學的變化

官方對於文革的討論禁令並不是一直如此。在文革結束不久，關於文革的批評和討論甚至還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回憶和論述都可以存在。但自從〈歷史決議〉被通過之後，鄧小平認為討論應該到此結束。事實上，雖然中共不希望討論文革，但是社會上一直在繼續討論文革，而官方卻一直在保持沉默。特別是在文革結束四十周年的今天，官方必須出來引導輿論之時，他們傾向用最簡短的語言重申既定的立場。他們很少主動去改變既定立場，因為新的表述往往帶有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2013年，習近平關於「兩個三十年」的論述意在平衡「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兩者之間的關係³⁹。據此，黨的歷史編纂學開始重新尋找文革中的優點以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積極的方面」。在2016年5月17日凌晨人民網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概念進行切割的新論述。文章提醒大家注意：「〈歷史決議〉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同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區分開來，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同這十年的整個歷史區分開來。」⁴⁰這是自從〈歷史決議〉被通過以來第一次明確說出一個從來不敢說出的真理，從本質上嚴肅地挑戰了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歷史決議〉的理解，即〈歷史決議〉意味着「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結論。針對這個區分，司馬南的評論說得很直接：「人民日報的署名評論中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徹底否定，對『文化大革命這10年的整個歷史』，沒有徹底否定。……如果對『文化大革命這10年的整個歷史』也要徹底否定，如果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也要做徹底的否定，那麼『前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在形式邏輯上也不成立了。」⁴¹現在，黨的歷史編纂學已經在「堅持」〈歷史決議〉的前提下，開始為這種矛盾的論述注入新的內容。

改變對〈歷史決議〉的理解還有現實中的原因。面對現實中的社會不公、官僚主義和腐敗等現象，毛派希望用毛時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希望黨史編纂學

能夠改變〈歷史決議〉中的論述，給予文革更好的評價。但問題在於，黨的歷史編纂學為甚麼要呼應毛派的要求呢？徐友漁指出了薄熙來在重慶所創造的所謂「重慶模式」同文革之間的聯繫。他認為，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民眾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依靠他們有關文革的記憶來尋找方法。因為文革結束後在政治上沒有創造新的政治參與渠道，民眾參與政治的要求似乎只能採取像文革那樣的鬥爭方式^②。文革與「重慶模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喚起了這種歷史記憶：「重慶事件提醒人們，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場早已被忘卻的噩夢，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危險……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文革得到億萬人擁護，他們真心誠意、狂熱地參加到這場政治運動中。要理解當前為甚麼許多人呼喚文革，就需要理解當初是甚麼原因使得人們投身於文革。」^③

在不改變政治體制的前提下，中共希望得到群眾的支持，但同時不能公開表現出支援薄熙來的信號。通過容納社會上對文革的正面評價的方式，黨的新領導集體試圖減少毛派通過討論文革來批評當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因為這種批評會危及他們鞏固執政合法性的努力。但是他們很清楚，如果繼續全面否定文革，有關文革的正面記憶、特別是文革中的政治參與經驗可能被利用來反對他們自己。儘管如此，接受這種給予文革正面評價的需要比回應文革時期受害的知識份子等群體更為迫切。打開這樣一種新的輿論管道後，黨史編纂學為習近平關於「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新論述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但這樣做的結果讓人非常吃驚：原來的加害者現在成為受害者，並利用他們作為受害者的新身份在社會上爭取影響力；而原來的受害者則有可能轉變為加害者，從而失去他們在話語權中的原有地位。

〈歷史決議〉無法成為主導敘事，新的論述則造成了黨史編纂學的兩難境地，這讓官方被迫走向更加嚴厲的管控政策，以致窒礙了人們對於文革的認識。「五十六朵花」團長在面對記者採訪時「感覺很冤」：「我對那個〔文革〕沒甚麼印象，我在演出前，也從來沒想過要往那方面靠，我想的就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主旋律，我認為那些歌曲是可以讓人團結一致，積極向上的……但一些輿論，給我們扣帽子、上綱上線。」^④或許，即使從官方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出發，也很難在「主旋律」和「需要全面否定的文革」之間劃上清晰的界線。

六 真相—責任—和解的路徑

文革作為一場規模浩大的政治運動，絕對不是在某一個時間點被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深刻地植根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框架。運動的真實情況涉及到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標籤化的理解無助於構建出一個多維度的文革圖景。在人民大會堂「五二」紅歌會的討論中，捍衛紅歌會的毛派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紅歌並不是文革中出現的，而是在文革之前的1964年^⑤，因而以此來指責紅歌會充滿了文革元素的說法是錯誤的。這確實是個事實，並且這個事實恰恰說明了文革與文革前的「十七年」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個事實也無法否認這首歌所代表的狂熱個人崇拜與文革之間的聯繫。

真相是形成共識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但甚麼是文革的真相？在像文革那樣充滿鬥爭的歷史事實面前，不同派別的人、在不同地方經歷文革的人、不同年齡的人都可能對同一個歷史事件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真相不可能只有一個。真相只能通過一個超越原來敵對界限的集體記憶過程才能建立起來。沒有這樣的過程，關於真相的問題似乎永遠也得不到答案。因此，無論我們站在怎樣的政治或現實立場上去面對過去的歷史，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試圖阻止、遮罩人們對於過去的探索和反思，不論對形成歷史的共識還是尋求對立的和解，都只會起到反作用。

有關真相的爭論關係到責任的認定，徐友漁提出不能迴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道德和法律責任^{④⑥}；最應該為文革道歉的不是響應號召、捲入運動的普通人，而是承擔發動文革責任的個人和團體^{④⑦}。毛派批評了宋彬彬的道歉，認為這是試圖通過簡單的道歉為當年在文革中有相似行為的所有人開脫罪責；如果要求國家道歉的話，可能會讓人們指責整個國家是一個「犯罪組織」，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其執政合法性^{④⑧}。真相的缺位讓記憶論述的競爭成為缺乏事實基礎的相互指責的遊戲，〈歷史決議〉在責任認定問題上的缺失也為現在的爭論埋下了伏筆。

在真相依然缺位的基礎上談論責任認定，必然會造成巨大的分歧。卞仲耘之死雖然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和討論，但是公眾依然不能確切地知道到底是誰打死了卞校長。卞校長的丈夫王晶垚也因此沒有接受宋彬彬的解釋，表現出他並沒有被該記憶團體的論述所說服^{④⑨}。另外，宋彬彬也沒有在道歉中指出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角色，而王則認為毛必須為他的錯誤負責，正是毛本人掀起了1966年下半年的暴力狂潮。由於以上的原因，王和他的家人拒絕參加宋等人在師大女附中卞校長的銅像前舉行的道歉儀式^{④⑩}。很明顯，如果她們道歉的目的在於實現和解，那麼這個目的遠遠沒有達到；如果她們道歉的目的在於保護自己，擺脫對她們在文革當中的一系列行為的懷疑，那麼這個目的也沒有達到。

半個世紀過去了，關於文革的學術研究和公共討論在中國大陸還受到各種限制。這些限制已經在塑造新的偏見和認識困境。關於以上兩個事件的討論很快就遭到了有關方面的禁止，《南方周末》的編輯還因宋彬彬的道歉事件寫了檢查^{④⑪}。事實上，關於這些事件的討論，本來可以成為彌合社會撕裂、尋找歷史真相、形成社會共識並走向最終和解的機會。在這樣諸多限制的情況下，愈來愈多的研究者發現，在中國進行文革研究的環境變得愈來愈困難。體制內的學者很難依靠文革研究拿到研究項目經費，在國內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並在學術上取得聲譽和成功；體制外的研究者則缺乏交流的機會和友好的研究環境。即使在現在有限的學術研究中，由於缺乏大量原始資料的支撐也開始走向了地方化和個人化。雖然這有助於構建一個更有層次的文革圖景，但是更多的情況下是研究者迫於現實的無奈之舉。中國的檔案館系統似乎並不是為了讓人們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而設立，而更像是有組織地阻礙這一目標的實現。對於文革親歷者的採訪活動也受到了限制，逐漸收緊的言論政策讓親歷者面對口述記錄時變得愈來愈謹慎。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限制並不只是針對那些努力尋找歷史真相或者構建反論述的研究者，就是那些試圖為〈歷史決議〉辯護的聲音也很難聽到。為文革設立討論禁區的政策是〈歷史決議〉的弱點衍生的一個副作用；而系統性地阻礙社會對於過去歷史的認識和討論，讓吸取歷史教訓和經驗變得不可能。儘管〈歷史決議〉已經在不斷出現的研究成果和時代變化面前顯得千瘡百孔，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不讓人滿意的〈歷史決議〉似乎還是需要有人來支持的。

最近幾年來，很多關心文革的人對南非、拉丁美洲的幾個國家怎麼樣面對自己的不幸歷史產生濃厚興趣。這些國家對歷史的反省均以達成社會和解為目的，雖然他們可能還沒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共識，但是對尋求真相、對理解在一個特定地方發生的特定事件產生了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就是：首先確立真相，然後分析參與者的各自責任，最後達成和解。這個反省過程有其好處，但也有其特定的文化特點，不一定能在中國取得成功。不過，起碼有一點是明確的：一個社會經過像文革這樣內戰式的歷史階段，亟需結束這種內戰式的記憶戰場，因此歷史反思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從我們對文革討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參與討論的各個記憶團體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和解，而是為了爭奪話語權。如果在一個歷史事件發生五十年之後，原來的敵對觀點依然繼續存在和鬥爭，這對整個社會抵禦危機的能力而言一定會起到負面作用——這個社會在遭遇下一次危機之時很可能無力應對。

註釋

① 單仁平：〈「文革」已被徹底否定〉（2016年5月17日），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shanrenping/2016-05/8937703.html>。

② 〈外媒：習近平「兩個30年理論」或受鄧力群智囊影響〉（2013年6月26日），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3-06/1716441.html>。

③⑦ 〈新華網：「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響演唱會在京上演〉（2016年5月15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dai/2016/05/363714.html。

④ 馬曉力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部長、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之女。

⑤ 郭睿：〈馬曉力專訪：搞紅歌會為文革張目是在給黨中央挖坑〉（2016年5月9日），聯合早報網，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60509-615000。

⑥ 許曄：〈五十六朵花團長回應紅歌會風波：絕對沒有宣傳文革〉（2016年5月6日），原載鳳凰網，原文已刪除，參見中國數字時代，<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5/%E4%BA%94%E5%8D%81%E5%85%AD%E6%9C%B5%E8%8A%B1%E5%9B%A2%E9%95%BF%E5%9B%9E%E5%BA%94%E7%BA%A2%E6%AD%8C%E4%BC%9A%E9%A3%8E%E6%B3%A2%EF%BC%9A%E7%BB%9D%E5%AF%B9%E6%B2%A1%E6%9C%89%E5%AE%A3%E4%BC%A0%E6%96%87/>。

⑧ 〈環球時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能有幾多觀眾〉（2016年5月6日），關鍵詞追蹤網，www.gjcz.com/p/H8L2e6gK/huan-qiu-shi-bao-chang-da-hai-hang-xing-kao-duo-shou-neng-you-ji-duo-guan-zhong/。

⑨ 嘉國：〈共產黨人不唱紅歌唱甚麼？〉（2016年5月10日），崑崙策網，www.kunlunce.cn/ssjj/f11/2016-05-07/96918.html。

⑩ 北京草原戀合唱團成立於1999年7月9日，主要由曾在內蒙古草原生活過的北京知青和在京蒙古族同胞組成。馬曉力從1999年起任合唱團團長。

- ⑩⑭ 高殿傑：〈陳忠實逝世、魏則西之死和紅歌會事件：中國道路的選擇〉（2016年6月3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ping/2016/05/364175.html。
- ⑫ 錢昌明：〈馬曉力為何陷入人格分裂？——從既唱紅歌又「舉報」的表演談起〉（2016年5月13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ping/2016/05/363576.html。
- ⑬⑮ 千鈞棒：〈為甚麼是馬曉力跳出來反對唱紅歌？〉（2016年5月10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ping/2016/05/363319.html。
- ⑯⑰ 〈五十六朵花團長：大會堂紅歌會掙6萬 投入百萬〉（2016年5月11日），原載中國經營網，原文已刪除，參見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511/14377893_0.shtml。
- ⑰ 關於「八五事件」和宋彬彬道歉事件的分析，參見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and Cui Jinke, "Whodunnit? Memory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7 (September 2016, forthcoming)。
- ⑱ 〈和吳迪對話：關於文革的記憶〉（2014年7月17日），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17/cc17wudiqa/zh-hant/>。
- ⑲ 宋彬彬：〈我的反思〉，《記憶》，第106期（2014年1月15日），www.xujuneberlein.com/Rem106.pdf，頁32。
- ⑳ 但真相未被揭露並不是因為她們當中有加害者；我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她們當中沒有加害者，所以她們才敢於走出這一步。一定程度上說，正因為她們的活躍才讓真正該負責的加害者繼續保持沉默。
- ㉑ 朱學勤：〈吐盡狼奶、開口奶：從宋彬彬道歉說起〉（2014年2月10日），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0100176.html。
- ㉒ 伏牛石：〈文革道歉背後的意蘊〉（2014年1月16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zatan/2014/01/313051.html。
- ㉓ 文化紅衛兵：〈億萬富豪高幹子弟為甚麼屢屢上演「文革道歉」鬧劇〉（2014年1月15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ping/2014/01/312973.html。
- ㉔ 時代尖兵：〈王晶壺拒絕道歉的目的是影射毛澤東〉（2014年2月3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zatan/2014/02/313478.html。
- ㉕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p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esting Interpretation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1期（2008年9月），頁97-152，這篇文章提供有關記憶團體更詳細的解釋。這個概念來自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有關美國黑人的集體記憶論述，參見Jeffre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 ㉖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p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97-152; "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8 (December 2006): 1070-91;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8); Guobin Yang, "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Internet",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7-316。
- ㉗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高默波分析了2006年文革爆發四十周年時網絡上的討論，指出「年輕世代」將文革視為公正和平等的代表，並將它同改革開放以來不斷積累的社會不公現象相對比。也可參見Guobin Yang, "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287-316。
- ㉘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p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97-152。
- ㉙⑳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第1-5版。

- ⑳ Andrew G. Walder,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 no. 3-4 (2014): 513-39.
- ㉑㉒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1070-91.
- ㉓ 例如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紅衛兵到各地去串聯，對於煽動地方的造反派批判當地的領導幹部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當然，也有很多老紅衛兵後來變成了保守派。
- ㉔ 王廷連認為，平衡評價「兩個三十年」是關係到正確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的大是大非問題。參見王廷連：〈「兩個三十年」，為何不能相互否定〉（2009年8月17日），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9865402.html>。
- ㉕ 所謂「三種人」是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
- ㉖ 〈胡耀邦批轉彭小蒙的一封信〉，載徐心華：《三記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40-41。
- ㉗ 〈附錄：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載米鶴都編撰：《難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香港：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頁168-69。
- ㉘ 關於「兩個三十年」的提法在2009年8月17日的人民網上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論述解釋了為甚麼1949年建國後的「兩個三十年」為甚麼不能相互否定。參見王廷連：〈「兩個三十年」，為何不能相互否定〉。2013年，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重申了這種觀點。參見梅宏：〈如何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的兩個30年〉（2013年2月19日），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
- ㉙ 任平：〈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前進〉（2016年5月17日），人民網，<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17/c1003-28355143.html>。
- ㉚ 司馬南：〈為《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第三自然段點讚〉（2016年5月18日），崑崙策網，www.kunlunce.cn/ssjj/guojipinglun/2016-05-18/97402.html。
- ㉛ 徐友漁：〈重慶模式和文革大革命——文革反思之一〉，《昨天》，第32期（2014年3月30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2014年3月30日第32期\(增刊\).pdf](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2014年3月30日第32期(增刊).pdf)，頁3-5。
- ㉜ 徐友漁：〈毛澤東爭取群眾的策略手段——文革反思之二〉，《昨天》，第32期（2014年3月30日），頁6。
- ㉝ 北部灣的風：〈「文革歌曲」和「文革期間流行的歌曲」〉（2016年5月10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shiping/2016/05/363313.html。
- ㉞ 徐友漁：〈不能迴避毛澤東的道德和法律責任——文革反思之四〉，《昨天》，第32期（2014年3月30日），頁11-14。
- ㉟ 徐友漁：〈如何道歉，誰來道歉？〉，《昨天》，第32期（2014年3月30日），頁35。
- ㊱ 黎陽：〈宋彬彬道歉是大好事〉（2014年1月14日），紅歌會網，<http://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01-14/42572.html>。
- ㊲ 王晶焄：〈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2014年1月31日），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4013099870.html。
- ㊳ 倫敦客：〈聲援93歲的王晶焄！——兼評宋彬彬的虛偽道歉〉（2014年2月5日），文學城博客，<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670/201402/3595.html>。
- ㊴ 參見《記憶》，第112期（2014年4月30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112.pdf>，頁58，「南周更正」。

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崔金珂 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研究生